



试读目录 | Contents

- 什么是《辞源》精神？
○ 严隽琪
- 百年《辞源》的现代意义
○ 王宁
- 辞书情缘四十载
○ 郑述谱
- 新发现的茅盾在商务的两件史料
○ 钟桂松

商務印書館館史資料

2016年7月

新六期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務印書館史資料

新六期

目录

内部资料
谨供参考

简 讯

- 1 “光辉永存——陈云生平业绩展”开幕仪式在
商务印书馆举行（图）

专 题 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纪念《辞源》 出版百年暨第三版出版

- 5 纪念《辞源》出版百年图集
8 百年品牌 文化瑰宝 商柏姿
13 什么是《辞源》精神？ 严隽琪
16 《辞源》的首创精神 何九盈
18 《辞源》第三版修订之路 于殿利
20 百年《辞源》的现代意义 王 宁
26 《辞源》修订本 1976—1983 回顾和前瞻 吴泽炎
33 《辞源》修订史略 沈岳如
44 陆尔奎与《辞源》 宗清元
46 《辞源》版本考略 乔 永

专 栏 “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创立 120 周年征文选登

- 5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
..... 厉以宁
60 学术的传承和学术的进步 厉以宁
62 辞书情缘四十载 郑述谱
74 我与商务印书馆的百年书缘 杨敬年

79	我与商务的情缘	周祖达
85	商务印书馆对我国西班牙语教学建设的贡献	孙义桢
89	《现代日汉大词典》编写忆往	姚莉萍

亲 历

95	怀念女作家关露	陈 锋
101	我对“掺沙子”的回忆	陈 江

钩 沉

104	商务印书馆与金长佑和他创办的 五十年代出版社	龚如甲
108	新发现的茅盾在商务的两件史料	钟桂松
116	“共和国民必读书”	夏晓虹
126	商务早期博物学图书出版	余节弘

信 牒

130	一位日本大学生和商务印书馆的通信
-----	------------------

顾 问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福康 陈 江 陈万雄
范 军 洪九来 林尔蔚
林丽成 柳和城 孟传良
钱普齐 汪家熔 汪守本
吴永贵 杨 扬 张人凤
邹振环

主 编

张 稷

编 辑

崔 珊

责任校对

张燕茹

编 印

商务印书馆百年资源部

出版日期

2016年7月

什么是《辞源》精神？

○严隽琪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辞源》的修订出版，向来深受国民关切。一部一百年前的工具书再版，仍然能够引起学界的热切关切和广泛关注，仍然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殷切期望，充分显示了《辞源》持久而强劲的生命力，也彰显了中国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珍爱。《辞源》自问世以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对于传续中华文化血脉、传承民族文化香火，贡献卓绝。今年正值它出版一百年，又逢第三版修订出版，能与在座诸位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我感到非常荣幸。

今天的活动非常好！我想它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这是一次关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再讨论、再认识。“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拟”，《辞源》就是这样一部国家层面的文化重器，它在学术上、文化上具有的重要意义，值得深入探讨。这点今天谈得很充分，我不再赘言。第二，这是一次向文化先贤的致敬！一百多年以来，以《辞源》编纂者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胼手胝足、前仆后继，于艰苦卓绝之中，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整理中华固有文化，走出了一条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的学术创新与文化复兴之路。我们应该记住这些闪亮的名字：张元济、陆尔奎、傅运森、高梦旦、杜亚泉、方

毅、庄俞、孟森、刘秉麟、陈翰伯、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让我们向这些文化先贤和时代先驱，表达最深沉、最崇高的敬意！第三，这是一次对近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发展史的回顾总结，更是一次学习“《辞源》精神”的精神洗礼。

一百年的《辞源》修订史，是一部浓缩了的近现代文化发展史，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待传统文化转型的智慧，体现出中华民族面对艰险苦难的高贵品质，充满着历史的启迪。我把一百多年以来，在《辞源》编纂中所展现出来高贵品质，称为“《辞源》精神”。

“《辞源》精神”首先是胸怀家国、传续文化的责任担当。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强国保种的最危难的时刻，传统文化面临存亡续绝、何去何从的困境，面临巨大的价值危机与传承风险。而强敌入侵、西学东渐，则必须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与科学文化知识，培育本土的现代新文明。1908 年，陆尔奎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之呐喊，于荆棘满途、无路之路中，启动了《辞源》编纂，致力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文明之间搭起桥梁。正是一代又一代文化先贤与时代先驱的不懈努力和勇于担当，中国传统文化在激烈的文化碰撞、复杂的制度变革和彻底的社会转型中，才得以传承、复兴和发扬光大。

“《辞源》精神”是文化为本、守正开拓的创新精神。

文化是民族的本体，“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但如何去伪存真、去芜取精，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则需要找到新方法。《辞源》在编纂方法、编辑体例、语料应用、内容主体等方面，进行了卓越的探索，创造了全新的格局，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的示范作用。《辞源》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语文辞书出版事业的发端；标志着国民有了第一部融新知旧学于一炉的新式辞书；标志着文化转型期的中国，不再受文化传承与文化普及之困，进入了“开学问进步之新纪元”。

“《辞源》精神”是俯首孺牛、宁静致远的奉献精神。

辞书的编纂修订，是常人无法想象之艰难工作，需要一辈人接着一辈人“前仆后继”。“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辞源》第一版，历时八年，先后五十余人参与，主编陆尔奎，因此而几近失明。第二版前后跨时近三十年，参与者难以计数，主持人吴泽炎积劳成疾竟致半身不遂。

第三版修订八年，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与，在座的何九盈、王宁、董琨等主编和编者，不顾高年，不辞辛苦，付出了惊人的努力，令人感佩之至！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想以上“勇于担当、善于创新、甘于奉献”的“《辞源》精神”，正是这种优秀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的代表；而《辞源》的编纂修订，正是“结合了新的时代条件，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相信，这样的精神和事业，将会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中发扬光大！

最后，祝贺《辞源》第三版修订成功！祝愿我国的文化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为将我国建设成为现代文化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2015年12月24日

百年《辞源》的现代意义

○王 宁

我国第一部大型辞书《辞源》，经过 8 年修订，今年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版。《辞源》第三版发行时，距第一版问世恰为 100 年。从 20 世纪初的 1915 年，到 21 世纪初的 2015 年，整整一个世纪。也许人们会问：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类辞书的编纂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具有首创意义的《辞源》，究竟应当如何定位？是否仍然具有原先的价值？怎样估量它的现代意义？

20 世纪初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

《辞源》首次编纂始于 1908 年，其时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英国产业革命的完成和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使新兴的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在列强纷争、弱国图强的大形势下，中国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和托古改制的维新变法并未能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师夷制夷”“变器不变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的改良主义思想，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要“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当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随着新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辞源》正是 20 世纪初中国文化

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语言的输入，《英华大辞典》《法华新字典》《中德字典》等大量外语学习词典陆续出版。其次是自然科学的普及与专科词典的问世，在《辞源》编纂前后，商务印书馆即着手编纂专门辞典20种，包括人名、地名、哲学、医学等。为翻译而编辑的《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等中西名目字汇，也相继发行。这些辞书的出版，适应了科学普及和科技发展的需要。

在大量的西学辞书纷纷出版时，《辞源》独树一帜，走了一条完全中国化的道路。第一版《辞源》的主编陆尔奎在《辞源说略》里指出：“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语言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大众阅读困难。所以编写辞书，存储词语，进一步存储了知识。陆尔奎得出的“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的结论，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说法。

我们可以用近代国学的代表人物章太炎的说法来补足陆尔奎的宣言。太炎先生在《常识与教育》《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中提出：“教育的第一步，就是使人有常识”，“晓得本国的历史，才算常识”，“本国人有本国人的常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辞源》收录的全部是中国经、史、子、集等典籍中实际用过的词语，解释的全部是这些词语在文献语境和思想建构中具有的本来意义。可以说，《辞源》是以古代典籍的语词及其解释为信息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库。

首创中国化辞书独特体例

《辞源》是清末到民国时期第一部收集中国古代典籍各类词语的辞书。在辞书编纂史上，它是空前的第一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的纂集类工具书，不论是字书（例如《说文》《玉篇》）、韵书（例如《广韵》《集韵》），还是义典（例如《尔雅》《广雅》），都以字为单位编纂。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字典》，是《辞源》所编字头的基础，它虽然也以字为单位，却有许多革新之处。我们根据蔡元培《新字典》序的说法，把《新字典》与当时最大的《康熙字典》比较，可以看出它有以

下几点革新:(1)《康熙字典》行世已两百余年,未加增改。不但新出之字概未收入,连市井通用的字都不具备。也就是说,它收录的字虽多,但很多是废字、死字;而《新字典》则直接从已有的文献语言中收录有用之字。(2)《康熙字典》的释义多是从之前的古代字书转录的,不考虑文献的适用,也不考虑是否合乎学理;而《新字典》的释义为了晓谕大众,要从实际语境中归纳意义,没有一个解释空设。(3)《康熙字典》和以往字书一样,只顾沿袭旧说来正名百物,不求甚解,全书不附一图;而《新字典》的释义为了晓谕大众,不但尽量让人明白,还有附图帮助理解。蔡元培指出:“于民国成立之始,得此适用之《新字典》,其于国民之语言及思想,不无革新之影响。”从《新字典》中,已经可以看到之后即将编纂的《辞源》理念先进,已经有了语义解释的概念。这时,章太炎已经提出将传统“小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改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特别将“语言”彰显出来。这说明,西方语言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传播。这是《辞源》在单字字头下立复词语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突破。说《辞源》是现代意义的辞书,也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

第二,《辞源》集多种体例于一典——列字头,分音项,排词语,出释义,列书证,详出处,一应俱全。

1.《辞源》虽然从“字本位”进入了语言层面,以词语作为释义的单位,但并不忽略汉字在汉语中的独特作用。它的字头不从古代字书中转相抄录,而是从词语中提取。字头既是词语的查检标记,也是辞书有机的组成部分。汉语的字既是语言的书写单位,又承载着构词的元素,具有别词作用。

2.《辞源》的部首继承《康熙字典》214部,从《说文解字》540部首中适应楷书的结构进一步归纳,采用结构部首,不是仅供查检的字形部首。例如:“攴”部(攴,音pu,俗称反文)和“攴”部分立,“网”与“四”(置、罪上部“网”的变体)放入同部,“肉”部与“月”部划分清晰,有明显的字理意识。

3.《辞源》将音项列在词语之前,遵从古代以音别义的历史现实。不同音项下词语的释义,参考古人的训诂材料,但不取古书随文释义的言语意义,不取《说文》的文字构意,不取字书中的直训(即以字释字),不取西化概念,而是从典籍的话语中概括出来,可以在语境中证实,完全是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自己建构的一整套释义规则。

4.《辞源》不收未曾使用过的字词,每个语词后列出的书证不是一般的语例,而是表明词语意义的出处,并以典籍的语境证实意义的存在。举《辞

源》第一个复词“一一”为例。释义为“逐一”，书证：“《韩非子·外储右下》：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引其纲而鱼已囊矣。”这表明，“一一”当“逐一”讲，较早见于《韩非子》，它是在书证引文的语境中实现的。

《辞源》首创的系统的体例，是中国独有的辞书体例，《辞源》以后的汉语辞书所用的基本编纂原则，尽在其中了。

就以上两点来说，《辞源》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的价值独特，它的首创而昭示后来的功绩，无可取代。

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

《辞源》经历了1915年正编、1921年续编、1923年合编、1983年结束修订第二版、2015年修订第三版。一路走来，它的基本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

不论《辞源》如何增改，它的基本性质仍然保存下来。1921年出版《续编》，它的编辑原则是补充新词，将新旧贯通。《续编说略》明言，正续两编“一则注重古言。一则广收新名。正书为研究旧学之渊藪。此编为融贯新旧之津梁。正可互救其偏”。1923年《辞源》合编后，就有了一部分《续编》收入的脱离中国本土文化的新词语及新释义掺入。在第二版修订时，为了保持《辞源》特有的性质和本土文化的特点，第二版《出版说明》明言，“删去旧《辞源》中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语，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1840年）；增补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目，并删去一些不成词或过于冷僻的词语”。这就使《辞源》贮存中国古代文献实用词语、阐释这些词语的言语意义与文化内涵、引导读者准确理解中国文化的编纂目的再次落实，也使《辞源》收词着眼通用，“不涉专门范围”的初衷保留下来。

在第二版修订的基础上，第三版修订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理念，要进一步明确《辞源》性质及其在现代大型辞书中的历史定位。不刻意扩大规模，不改变原初性质，要在恢复和进一步保留其独特价值的前提下精益求精。

第三版修订做了八件事：

一、对《辞源》的字头、行文、书证的用字，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确定了字的主形，对应当保留的异体字如数保留，并与主形加以认同；确定了标准的字样，去除了冗余的异写字形，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古籍印刷通用字

系统，也使电子版检索的准确度大幅度提高，《辞源》用字成为“古籍印刷通用字字形规范”的基础。

二、采用公认的音韵系统，逐一清理了《辞源》字头的上古音、中古音和现代音的标注，使《辞源》注音基本达到音义契合，古今贯通；改变了第二版音系不统一的局面，使注音系统面貌一新。

三、本着避免芜杂、求准求精的原则，对字头、词语作了必要的增补。这次修订增补了 1302 个字头，增补的原则是：符合古籍用字规范，并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实际使用过，也就是有实际语境、形音义可考的字；增补了复词语 8512 个，根据此前《辞源》百科词条不足的情况，其中特别补充了 6500 个百科词语。第三版《辞源》全典仅仅增加了 200 万字，合理地扩大了规模。

四、认真考察了书证与释义的互相切合关系，进一步体现了书证对释义的加深和补足作用；全面关注、认真改进释义的冗、缺、漏、错；对具有汉语特点的典故词，进行了典源、典义、典面的历史梳理；补充了文化与名物词相应的插图，对语言释义做了直观的补充。

五、采用可靠的文献版本，复查了大部分书证的原文和出处，纠正了第二版书证讹、夺、衍、倒的错误和出处不确之处，置换和补充了一部分对梳理源流有用的书证，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约四万条。

六、细化了字、词、音、义、文、事互见的体例，将《辞源》中的相关条目尽量沟通。这样做，有利于克服辞书信息碎片化的局限，便于读者整合知识，取得更全面详尽的信息。

七、在第二版修订资料缺失的情况下，第三版在修订过程中，归纳确认了一批原有的编纂规则，又补充制定了一批新的编纂规则，其中很多规则是在语言学、文献学、辞书学的理论指导下确定的；形成并进一步完善了《辞源》的编纂体例，使此次修订更具理性化。

八、采用现代化手段，有效地建立了第三版修订的档案，为今后进一步修订做了必要的准备。

历时八年的《辞源》修订，是一次编审人员和上百位专家利用业余时间通力合作的攻关，是一次边修边学边研究的多学科、大规模学术活动，是一项知识界用高度历史使命感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努力拼搏的爱国举措。《辞源》第二版主编吴泽炎曾说：“《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第三版修订人员置身于这个事业的中途，付出固然艰辛，但也应当是一种幸运。

通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

《辞源》是20世纪初社会文化和思潮发展的产物，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它的产生受到西方以辞书形式传播知识、传播文化的出版事业的影响，但《辞源》在内容上却立足中国本土、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辞源》不收引进的词语，它的“百科”的概念也不以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为分类标准，而是参考中国古代文化词语与名物词的分类。它保留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话语权，有利于国际对话时本国的立场。例如，参考《尔雅》在通语（释诂、释言、释训）之外的亲、宫、器、乐、天、地等16类；《释名》的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等27类。

中国很多词语用来翻译西方的概念，有些概念也被现代文化所吸收，但《辞源》仅仅保存我们自己古代的话语意义，并不涉及国外与现代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现代有很多定义，但《辞源》的解释是“民之主宰者，（旧指帝王或官吏）”。书证用《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用《三国志·吴·钟离牧传》：“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再如“文化”一词，现代也有了几十种定义，但《辞源》的释义仅仅是“文治和教化”。书证用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用《文选》晋·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辞源》的宗旨是为阅读者还原中国古代对这个词语使用的原貌，使读者不用外国的和现代的词语意义去附会古代，这样才能形成必要的国际对话和古今对话。

今天，我们迎来了弘扬传统文化最好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是当前文化建设最关键的问题。传统文化的传承，首先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和辨识能力，培养能够把传统文化引向现代的人是当务之急，这样的人应当是既能真正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能用自己的话语与西方对话的人，也就是在人文科学上能够正确对待继承和借鉴的人。《辞源》在这一方面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原载 2015 年 12 月 22 日《光明日报》11 版

辞书情缘四十载

○郑述谱

欣逢商务印书馆 120 周年馆庆，我作为商务的老作者，被约请撰写一篇纪念文章。静下心来，屈指细数，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与商务印书馆结缘已经有 40 年了。

因缘巧合走上词典编纂之路

前辈学人曾说过：“学者不可无宗主。”如果把这里说的“宗主”理解为学者的师承关系，那么，黑龙江大学的词典编纂活动，其宗师应该是其前身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原院长赵洵同志。上世纪 50 年代，她就主持过俄汉成语词典的编纂。50 年代末，她在莫斯科大学进修时的导师是著名的兹维金采夫（В. А. Звегинцев）教授。她选定的攻读方向便是词典学。60 年代初归国后，她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在中宣部有关领导人的帮助下，突破重重阻力，最终组建起一个俄汉词典的编写班子，这虽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研究所实现的，但编写班子的主要成员却都是从黑龙江大学借调过去的。师承赵洵从事词典编写的有她的一大批学生，其中包括李锡胤、陈楚祥、潘国民等，可视为其中的优秀代表。进入 21 世纪，他们三人先后荣获“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记忆把我拉回到 1975 年。那年 5 月，“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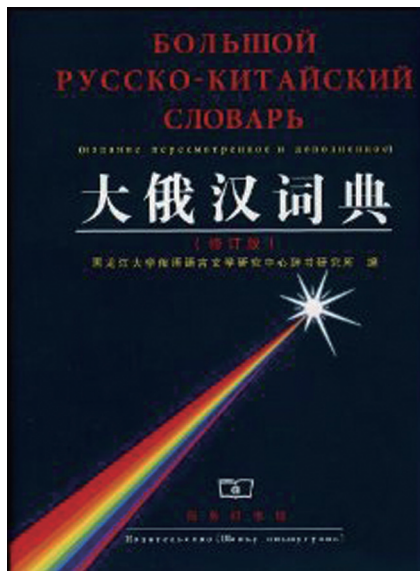
会”在广州召开。黑龙江大学的李锡胤先生应邀出席了会议。其实，在那以前，黑大已经接受了商务委托的“挖版修订”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辞典》的任务。会议之后，原来的“挖版修订”升格为全面修订，原属两个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似乎也具有了某种“国家规划”性质。借着这个名义，以黑大俄语教师为主体，从哈尔滨市多个单位借调来的 50 多人的修订班子开始搭建。

当时我还是一个处于教学第一线的青年教师。按照常规，像我这样刚刚 30 多岁的年轻人，是不会被安排做这种看似老气横秋的词典工作的。偏巧正赶上我带的首届 72 级工农兵学员班要毕业，我已被安排去农场劳动锻炼。负责搭班子的系领导在急于用人之际打起了我的主意，并经学校党委书记同意，让我暂缓走“五七道路”，转而参加具有“反修”意义的词典修订。

不承想，这个偶然的安排，竟成为我一生业务生涯的转折点，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部部词典编下来，一直干到我现年满 75 岁。这样，借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大半辈子我都被拴在了有“工具书王国”美誉的商务印书馆这辆战车上。其实，说我“被拴在战车上”并不恰当，因为我不是被动的，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我本人也求之不得，乐此不疲，从来没有动过主动从这车上走下来的念头。我参与或主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典有：《大俄汉词典》（1985）、《大俄汉词典（修订版）》（2001）、《便携俄汉大词典（修订版）》（2007）、《乌克兰语汉语词典》（1990）、《新编乌克兰语汉语词典》（2013）、《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2014）、《新时代俄汉大词典》（即将出版）。从 1975 年到 2015 年，整整 40 个年头啊！人生能有几个 40 年？我不禁发出人生苦短的慨叹。不过，回忆起历历往事，充满我内心的感受，似乎只有庆幸、满足与温馨。

可敬的商务编辑们

我最早接触的商务人是潘安荣和吕军。当年，他们是代表出版单位来哈尔滨与词典修订者见面的。他们面对的是几十人组成的修订班子，我作为普通成员，没有机会靠前，与他们作近距离的接触，只能坐在一个大教室的角落里，远远地听他们讲话。今天想来，他们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敬业、严谨，但不苟言笑，甚至略显古板。在后来的许多年间，接触的商务人多了，我逐渐发现，敬业、严谨、讲究诚信、一诺千金，似乎是商务人的共性，但不苟言笑，略显古板，这是当时刚刚经历了“文革”劫难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心



有余悸的自然流露，还是某些商务人的个性特点？到现在我也说不准。

我第一次走进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的商务印书馆大楼，大约是在 80 年代初，即词典交稿之后。那时，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挤在同一座楼里。楼里好像还有人住宿。办公的条件自然不敢恭维。到处都堆满可能是资料或书稿之类的纸捆儿，看上去破破烂烂，上面落满灰尘，让人不由联想起“文革”大批判中常说的“故纸堆”这个词。与读者的主要联系方式当然是书信。偶有急事，也可能会拍电报或打电话。但凭我个人的经验，商务的长途电话似乎很难打通。即使偶尔能幸运地拨通号码，也要等好长时间才能传唤到要找的人，让等的人为白白花掉的电话费心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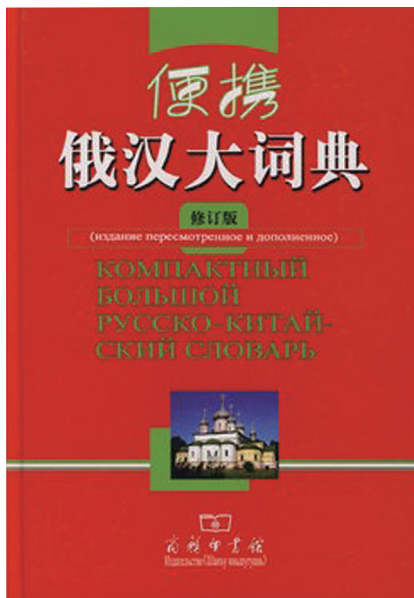
词典的责任编辑南致善先生可能是我接触的最年长的商务人。据说，南老曾在哈尔滨中长铁路供过职，是令人尊敬的前辈。我见到他时，他戴着一副银丝眼镜，头发一丝不苟，白皙的皮肤，洁白的衬衫，挎背带的裤子，加上和蔼的态度，轻柔、徐缓的语调，一派儒雅、温厚的长者形象。我们的词典是卡片交稿。全部稿子捆成一摞摞约一尺多长的卡片捆儿。南先生整个人就埋在这一捆捆卡片堆里，聚精会神地审稿，一笔一画地改稿。他的衣着形象，与周围看似仓库管理员的工作环境，显得很不协调。

后来接触最多的是潘安荣先生。他算是刘泽荣的入门弟子，专攻俄汉词

典编纂，但是，据我观察，他个人真正的学术兴趣却是在文学翻译方面。他最感兴趣的是俄罗斯作家普利什文作品的翻译。我记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他的译文集。审读词典稿时他最关注、提出意见最多的往往也是针对翻译，这一点我早就注意到了。后来，当我主持第一次《大俄汉词典》修订时，在我给他写的修订情况汇报里，除去介绍增加新词等一般情况之外，我有意举出一些译文加工提高的实例。他看了以后，充分肯定地说，这是词典“内在质量”的实质提高。他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颇为流行的俄罗斯歌曲《山楂树》实际上应该译为“花楸树”，这可以看作是他的文学兴趣与词典业务结合而得来的收获。

广州会议之后，他北上哈尔滨，南下广州，西走重庆，与黑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大学，分别就不同的双语词典选题达成了合作协议。今天看来，他的作为堪称是在为词典事业的发展从宏观上布下大局。他曾用他那略带沙哑的男低音不无得意地亲口对我说过，有一家在京的出版社请他去介绍词典组稿的经验。他说，我就是一句话，只要找对了合作单位与领头人，其他就什么都有了。我听得出，对商务与黑大的合作，他显然是满意的。

说到他词典外的个人学术兴趣，这非但不妨碍他的本职工作，甚至还启发他在这方面有所创新。《便携俄汉大词典》的编辑与出版就是一个很能说明



问题的实例。这部词典可以说完全出自他的创意。而他的创意灵感恰恰来自他的文学兴趣。据他的实际体会,《大俄汉词典》部头太大,躺着看小说的读者们查起来不方便。读者需要一本收词多、部头小、可以躺着查的词典。于是,去掉大型词典的例证、只提供简明释义的便携本词典的创意便产生了。这部词典后来的市场发行量远在《大俄汉词典》之上。这可以证明,他提出的这个词典定位是很有读者针对性的。看来,正襟危坐查阅词典的人可能远不如躺着、靠着、站着查词典的人多。

另一个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深为赞赏的是出版《词典学论文选译》(1981)。这极有可能是李锡胤与潘安荣的共同创意。这大概是国内最早介绍国外词典学理论的译文集。译者几乎都是我们修订班子的成员,其中也包括我本人。而原作者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前苏联。后来国内辞书学界耳熟能详的谢尔巴那篇名作《词典编纂学一般理论初探》就收在这部文集的开篇。显然,文集的组稿者已经意识到结合词典编纂开展词典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这个想法不仅在当时属难能可贵,对后来词典学的发展更具有深远意义。在后来的词典学论文调查报告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来自黑大的论文曾占有相当大的分量。辞书界有人甚至不无赞赏地把黑大说成是词典编纂与辞书学研究的“北方重镇”。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具有如此意义的文集的署名是“石肆壬”,即译者



共“14人”的谐音，这几乎等于没有署名。这种做法也许是出于两位创意者的“心有余悸”，或是他们“夹着尾巴做人”的谦虚品格使然，亦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不得而知。但它能明显透出那个时代的痕迹。

刘泽荣的《俄汉大辞典》以 30 年代苏联出版的乌沙阔夫词典为主要蓝本。70 年代的修订者自然会吸收更新的词典学理论和参考更新版本的俄语词典。于是，修订后的词典面目与原词典在诸多方面都渐行渐远。潘安荣与刘华兰（刘泽荣的女儿）来到哈尔滨，读了部分修订稿，很快就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觉得，仍以《俄汉大辞典》修订版的名义出版未必合适。这时，修订班子的业务负责人陈楚祥、李锡胤等，也表现出了应有的负责精神与敢于自立于词典编者之林的担当精神。他们同意了潘安荣的建议，词典修订稿以《大俄汉词典》的名义作为一部新的词典单独出版，与刘泽荣的《俄汉大辞典》并列发行。

今天想来，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这件事的当事各方，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互相尊重、友好协商、勇于担当的精神，不仅在词典工作中，而且在任何成功的大型协作项目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新的《大俄汉词典》仍没有具体个人署名当主编。

商务印书馆的远见——《乌克兰语汉语词典》

80 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始人姜椿芳，通过黑龙江省委给黑大下达了将《苏联百科词典》译文初稿加工定稿并编辑成书的任务。通过完成这项任务，词典组成员得到了新的锻炼，对工具书的认识也有了许多新的体会。这对他们后来的业务取向很有影响。在这项任务最终结束之前，即 1984 年，我得到了一个赴加拿大做访问学者的机会。

我的合作者是一位乌克兰裔的政治学教授，预定的研究课题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后来，他发现我有多年的词典编纂经历，随之建议我编纂一部《乌克兰语汉语词典》，还说这比原来的课题意义要大得多。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我的词典编纂经历，有时候还可能很被人看重。乌克兰语与俄语同属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但毕竟是不同的独立语言，我能胜任这个课题吗？带着一些疑虑，我试听了乌克兰语课，搜集了多部乌俄、乌英与乌语详解词典，并进行了试编，之后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于是就与赞助方重新谈定了合作条件。我坚持在加拿大期间要做一些在国内无法做的事，而词

典可以在我回国以后再去完成，对方对此表示接受。我们利用对方提供的词典编纂经费，根据需要，增加并扩大了与对方的合作内容与交流范围。

回国之后，我与词典组的同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了这部词典的编纂任务。接下来，涉及到出版问题，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商务提出申请，并表示加方还可以为出版提供一定费用。没想到，商务很痛快地就答应出版，而且不需要我们再支付任何费用，还同意由我署名做主编。

词典出版以后，正赶上苏联刚刚解体，在短时间内，我收到上百封世界各地乌克兰人的来信，或表示感谢，或索购词典。这时，对当初政治学教授提出的作为世界上第一部乌克兰语汉语词典选题的意义，我有了更切实的理解。在这件事上，我还深切感受到了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家级出版社高瞻远瞩的大局观，以及对我个人的支持与提携。事情到这里还不算完。

90年代末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有关合作的意向，决定编纂一部规模更大的乌克兰语汉语词典。这项任务后来由社会科学院乌克兰研究室的一位研究人员挑头，他恰恰是我们黑大的前辈校友。他辗转得知了我的情况，并把我当成了“先行者”，专程来到黑大“取经”，并争取到黑大的若干人加盟，成果最终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新编乌克兰语汉语词典》（2013）。



商务印书馆的胸怀——《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

从加拿大访学归来的我，得到了学校的提拔，很快我就被任命为俄语系主管教学与科研的副主任并兼任辞书研究所的副所长。与此同时，随着学校的教学任务日渐繁重，辞书所的存留便成了一个问题。

完成了《苏联百科词典》任务之后，时任辞书所所长的李锡胤与副所长潘国民等，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领导的赵洵，策划编纂一部“熔语词与百科词典于一炉”，以大量采用书证为特点的四卷本的俄汉词典。为此，他们曾给黑龙江省委写信，阐明这个课题的意义，当然，也想借此证明辞书所继续存在的理由。因为这是越过学校领导的行动，出于对我这个“年轻干部”的爱护，他们有意没有让我在信上签名。但我在得知有关情况后，坚决要求签上名字。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在关键时候能够与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良好反响。不知是赵洵与省委有关人士的谈话，还是我们的集体签名信起了作用，最终省里给黑大特批了八个科研人员指标，辞书所总算有了一个继续存在的合法依据。

为了最终搞定编纂四卷本《详解词典》的项目，李锡胤提出了所谓“三通”的方针，即“通天（求得上层支持）、通钱（解决经费）、通外（纳入中苏合作项目）”。解决前“两通”，几乎只能靠赵洵向她的多位老领导和老同事求助。据我了解，赵洵曾找过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夫人、剧作家李伯钊“化缘”。而“通外”却是黑大联手商务印书馆通过文化部外联局共同实施的。我自己亲身参与过和商务协商接待苏方对口的出版社专家。那是我第一次与商务具体负责外事的杨德炎先生打交道。在馆一级领导里，从部队转业不久的王新善恰好是黑大前身哈外专（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的老校友，他也算是赵洵的学生，对老校长的事自然全力以赴。

当初，《大俄汉词典》的编写耗时五年，而编辑排版也耗费了五年时间。照这样的进度，篇幅远超《大俄汉》的《详解词典》，编者是否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它的出版，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已经升任所长的潘国民对这事比别人考虑得更多。

那时，关于用计算机编词典的报道已经不少，但在国内实际采用的还不是很多。北大方正的技术可能已经步入市场，但还远非完善，特别是牵涉到

俄文，有待解决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潘国民经反复考虑，最终提出了采用电脑自行排版的大胆想法。但遇到的困难，是外人很难想象的。首先是经费，其次是技术，当然还有周围人认识上的分歧。他请求商务方面给予前期资助，商务的反应很谨慎。后来曾专门派人来哈尔滨考察，最后的回答是：如果黑大方面能拿出合格的排版成果，商务可以付费，至于说前期投入，他们那里没有先例可循。这样，潘国民原来指望的经费支持就完全落空了。我也曾专程来京向一家专业的研究所寻求技术援助，还签了意向合同，预付了 3000 元钱。但后来对方单位竟被撤销，事情不了了之。这使潘国民的积极构想几乎完全破灭。

恰在此时，当地出版社的一位资深老编辑，也是黑大的校友，得知了这一情况，看准了《详解词典》的分量，并说服了自己的领导，同意拿出 10 万元经费支持辞书所开发电脑排版，条件是：词典须交由该出版社出版。在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之下，为了继续生存，潘国民准备答应对方的条件，并忍痛向商务提前做了准备脱钩的通报。

黑大辞书所与商务之间的联系，一直都是通过潘安荣转达的。潘安荣在收到这封信以后，立即回信，要我们务必再多宽限一点时间，他要去领导那里做最后的争取。几天之后，潘安荣来信告诉我们，他已经做了最后的努力，领导的态度没有变化。他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结果，失落的情绪溢于言表。这样，黑大辞书所与商务印书馆就《详解词典》进行的合作便终止了。再后来，果然如那家当地出版社所期望的那样，《详解词典》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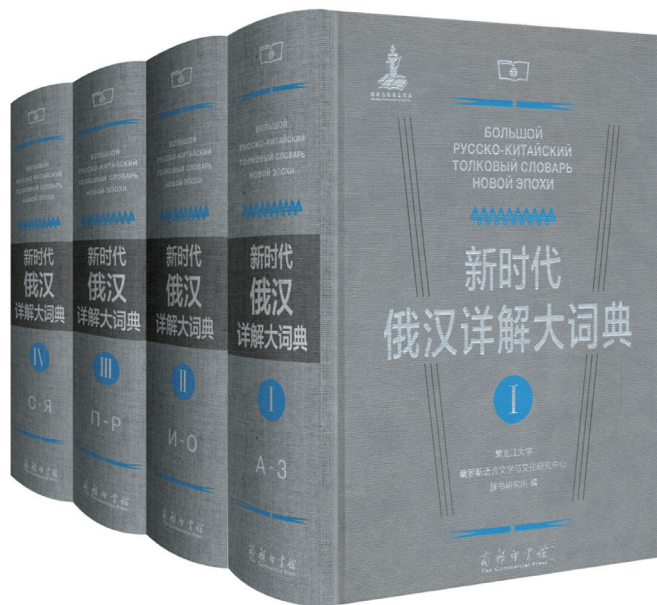
后来，在一次开会的休息时间，我亲耳听到商务时任领导杨德炎问前任领导林尔蔚，当初怎么会让《详解词典》脱离了商务。林回答说，他们要求提供前期排版资助，因为没有先例，我们迟疑了一下，他们就拿走了。如今想来也是，这么大型的词典，编辑单位又拿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排版业绩，却冒险地想要自己排版，涉及的费用又不是一笔小钱，当领导的自然会慎重对待。

不过，更让我感动的是，这位前任领导，对那家“撬走”了这个项目的地方出版社竟毫无怪罪之意，他一如既往地允许那家出版社采用租借《现代汉语词典》版型的方法，以缓解社里的资金困难。这个细节让我对作

为“行业老大”的商务的胸襟之广大，有了具体的体会。不过，事情还不算完。

潘安荣对《详解词典》并没有就此死心。即使在脱钩之后，他还多次通过李锡胤和我向潘国民转达，希望在 10 年合同期满之后，《详解词典》仍能回归商务。这也许就是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吧！这样一部词典，由一般出版社出版与由商务出版，社会效益会大相径庭，这一点潘国民当然也一清二楚。到了 2005 年，商务通过来京开会的李锡胤，再次提出“回归问题”。只是那时李锡胤本人已经决定不再从事词典工作。没过多久，潘国民和我等 10 名原编者与商务重新签订了《详解词典》的修订出版合同。又经过 10 年的艰苦工作，许多情况下是潘国民一人独立支撑，这部词典终于以《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的名称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只可惜杨德炎、潘安荣等人已经作古，没能亲眼见到这一天。

还必须补充一点。早在这以前，黑大在商务出的其他多部词典，都已经是自行排版。这大大加快了出书流程，保证了校对质量。总之，能自行排版，如今已经成为黑大辞书所的一个业务优势，这一点也得到了商务的认可。当初分道扬镳的事，不过是今天两家人轻松的谈资而已。



半个商务人

如今的商务印书馆大楼门前，横卧着一块花岗岩巨石，正面镌刻着郭沫若手书的“商务印书馆”，背面有“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题词。门前的多块牌匾，与这题词交相辉映。其中的一块是“中国辞书学会”。每次看见这块牌子，我会不由地联想起我与这个学会的缘分。

事情要从上海辞书出版社主办的《辞书研究》杂志说起。

这个专业刊物的创刊时间与我们开始修订词典的时间几乎相同。它很快就成了我钟爱的业务园地与学术论坛。编辑部也注意到了我是一个很积极热心的作者。1988年，该刊邀请国内十多位作者在上海召开业务研讨会，我是被邀请者之一。我记得，当时上海正流行因吃毛蚶引发的肝炎，我也刚刚做过结肠癌手术一年多。经过一番犹豫，我还是决定赴会。这就是“首届全国辞书学研讨会”。参会的大多是后来在辞书界颇具影响的专家，如杨祖希、徐庆凯、钱剑夫、陈炳超、王德春、梁式中、金常政、赵振铎、陈楚祥、汪耀楠等。李锡胤与黄建华因故未能赴会。我与另外三人要算是参会的“小字辈”。会上已经提出了筹建中国辞书学会的话题。

接下来的“第二届全国辞书学研讨会”是1989年在武汉湖北大学召开的。会上，为成立辞书学会多方奔走的汪耀楠还专门就进展情况向会议作了汇报。1992年10月底，中国辞书学会最终宣告成立，并作为一级学会，挂靠教育部语信司，而秘书处则几经辗转最后常设在商务印书馆。

鉴于当时辞书市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况，新闻出版署委托辞书学会开展优秀辞书评奖加以正面引导。我有幸作为评委至少参加了三次从初评到终评到颁奖的全过程。这使我成了商务的常客，使我有机会与出版界、辞书界的多位领导人与著名学者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他们的崇高境界、优秀品格、深厚学养都给我留下高山仰止、终生难忘的印象，使我有机会领略到来自其他行业、其他学科专家们过人的睿智与才情，也使我的得以跨学科、跨行业地汲取有益的学术滋养。

后来，商务印书馆建立了辞书研究中心，我荣幸地被聘请为客座研究员，不时收到反映语言学研究前沿动态的宝贵资料。每次有事来京，商务几乎成了我必去之处，我觉得自己几乎成了半个商务人。

直到今天，在课堂上，不管是面对稚气未脱的本科生，还是已有专业积累的博士生，我都会说，词典，这是学习语言最可信的老师；编词典，研究词典，是研究语言的最好切入点。虽然这话我明知难免有片面性，但它却是我个人真实的业务体会。

我的回忆，既是我个人与商务结下的辞书情缘的真实记录，也是黑龙江大学与商务印书馆词典编纂合作走过的历史的部分写照。我从一个大型词典一般参与者逐步成长为整个项目的主持人，成为“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之一。这其中有不少是商务给了我机会，为我搭建了平台，而我只是抓住了这机会，利用了这平台。我从商务印书馆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多，而我回报给它的却很少很少。值此商务印书馆建馆 120 周年之际，我由衷地祝愿它的事业永远辉煌。

原载 2016 年 4 月 6 日《中华读书报》15 版

新发现的茅盾在商务的两件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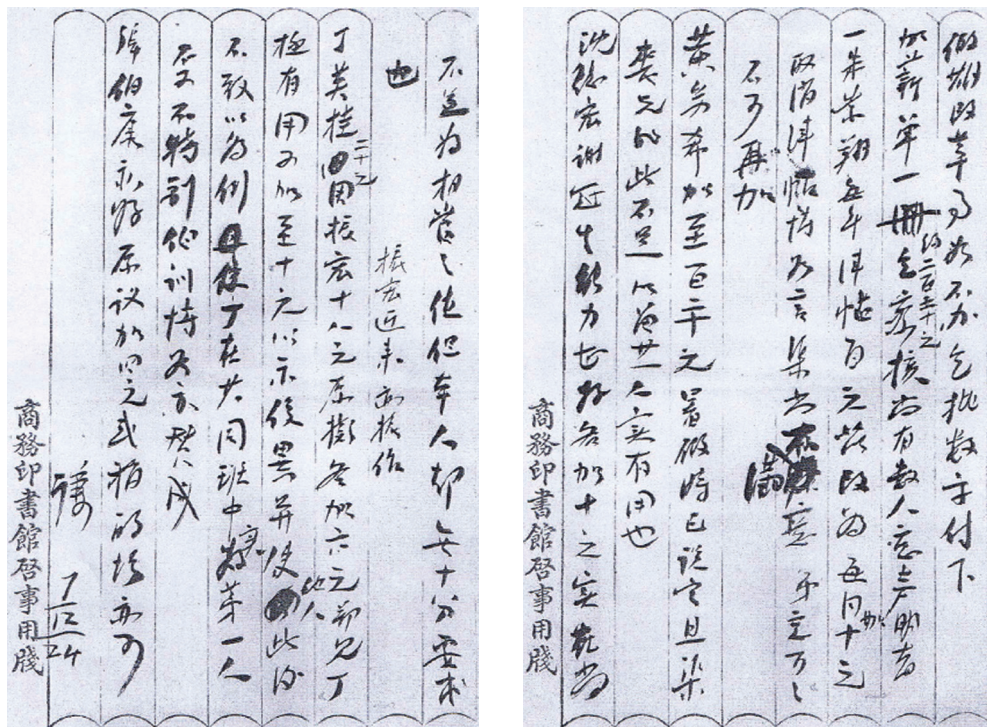
○钟桂松

因为写《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一书，近年来我除了梳理自己多年积累的史料外，还专门在档案中寻找茅盾的有关史料。2015年8月，我从茅盾故乡浙江省桐乡市档案馆保存的茅盾档案中，发现两份茅盾在商务的稿费单和加工工资的档案，都是我过去没有见到过的。

这两件史料共五页。一件是高梦旦先生1918年12月24日为茅盾加工工资一事的报告，其中高梦旦先生写的手迹不全，只有两页，保留了涉及茅盾部分的手迹，估计是茅盾收藏时有选择的缘故；另一件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20年7月为付茅盾4、5、6月的翻译稿费清单和报告，有三页，其中一页是报告，两页是清单，主要是作品目录、字数、稿费数额等。这两件史料，是茅盾的儿子韦韬先生2007年捐献给桐乡市档案馆的。它们十分珍贵，信息量也不小，现作专文简要介绍。

第一件史料是1918年12月24日高梦旦为加工工资写的材料，从内容看是残缺的，没有头，只剩后面的两页，在前面似应还有一页或者两页。所剩两页的内容如下：

假期改革事，如不办，乞批数字付〔附〕下。



加薪单一册约二百五十元，乞察核。尚有数人忘声明者，一朱紫翔每年津贴百元，兹改为每月加十元，取消津贴，博如言，渠尚不满意，弟意万万不可再加。黄□希加至百二十元，暑假时已谈定，且渠丧兄，如此不足以留廿一人，实有用也。

沈德宏〔鸿〕、谢冠生能力甚好，各加十元，实在尚不足为相当之值，但本人却无十分要求也。

丁英桂二十元，周振宏十八元，振宏近来亦振作，原拟各加六元，弟见丁极有用，可加至十元，以示俊异并使他人此后不致以为例。丁在其同班中实为第一人，□不特别，伯训、博如亦赞成。

张伯康亦好，原议加四元，或稍酌增亦可。

谦 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这份材料，写在“商务印书馆启事用笺”上，文字上除个别字难辨认外，其余都比较明白，是对一些人的加薪方案及点评，涉及茅盾等人的文字，可以看出颇有好评，认为“沈德宏〔鸿〕、谢冠生能力甚好，各加十元，实

在尚不足为相当之值，但本人却无十分要求也”。

茅盾在回忆录中讲到加薪事，只讲到第一次加薪的情况。即 1916 年底，茅盾接到通知，从“下年正月起，每月薪水三十元，即每月加了六元”。茅盾还知道，“进馆半年即加薪，虽只六元，已是破格优待，编译所中人员，进去为二十四元者，熬上十年，才不过五十元而已”。所以，第一次加薪，虽则六元，茅盾已经心满意足了，心态非常好。

而这次加薪，应该是茅盾在商务的第二次加薪。这次加薪，距上次加薪，已经快过去 20 多个月了，但是这次加薪幅度比上次大，加十元。而且在加薪的同时，还获得领导的好评，认为“沈德宏[鸿]、谢冠生能力甚好”，而且，姿态也高，所以领导认为，给他们两个各加十元并不为过，因为与他们为商务印书馆做出的贡献和创造的财富相比，“实在尚不足为相当之值”。而且，茅盾和谢冠生都还十分低调，对薪水都没有什么要求，“无十分要求”。编译所领导从加薪这件事情上，看到了茅盾、谢冠生两位年轻人的人品，所以，领导用欣赏赞许的口气肯定在这次加薪过程中沈、谢的表现。这是目前见到当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领导在报告中正式表扬青年茅盾的史料。

那么，这个加薪方案是出自谁的手笔？据落款“谦”字来推测，应该是刚刚从张元济手里接任编译所长的高梦旦先生所为。高梦旦，名凤谦，字梦旦，福建人，1903 年进商务印书馆，此时任编译所长。所以，所内雇员的薪水方案应该由他提出，这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同时得到表扬的谢冠生是编译所词典部编辑，与茅盾同住一室的年轻人，茅盾在回忆录里也多有提及。这一件史料中涉及到其他人员的加薪和评论，同样是商务印书馆留下来的珍贵史料，因与茅盾无关，这里不再叙述。

第二件珍贵史料是编译所一位领导于 1920 年 7 月 8 日为付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杂志上的翻译稿费而向张元济写的专题报告。共三页，比较完整。但是落款的名字难以辨认，用□代之，希望识者给予指正。其原文如下：

雁冰近三月中本馆所付译费兹另单呈

核此君月薪四十八元，办事精神尚好，惟担任外间译件不少，近又充共学社社员，终恐不免有纷[分]心之处。向来座位设在四部丛刊中，此数月来实与四部事甚少关系，每月约担任东方、教育杂志一万字

雁冰近二月中本館付印之傳費亦為卑主
核此月月薪四元不辦事精神尚壯惟在加同條件不少近又
充其學社義務不免有餘心之虞向來座位設在日新報中此數
月來實與之無異因該每月仍任東方教育雜誌一百字若
有不付譯費而里期延座位移於樓上未在前六號字之三座位
向就易勝察此以成後或可稍信此復
萬生先生 佳
9/1/8

沈雁冰君譯稿		我們該怎樣預備了去談婦女解放問題	婦女雜誌用
✓ 第一飛行機	婦女雜誌用	三篇九千字	拾伍元
✓ 新婦女界之評論	婦女雜誌用		
✓ 近代文學的反流篇	東方雜誌用	一萬四百字	貳拾陸元
✓ 女子的覺悟續	婦女雜誌用		
✓ 娼妓與貞操	又	一萬七千字	貳拾伍元
✓ 以上月份共稿六種合計洋陸拾陸元			
✓ 新社會的結婚和家庭	婦女雜誌用	三千字	柒元
✓ 家庭服務與經濟獨立	又	一千六百字	
✓ 安得列夫	東方雜誌用	五千字	拾貳元
✓ 兩性衝突的原因	婦女雜誌用	八千字	拾玖元
✓ 以上五月份共稿四種合計洋叁拾捌元			
✓ 娼妓與貞操續	婦女雜誌用	(萬五千字)	貳拾肆元
✓ 怎樣能使婦女運動有實效	又	一千五百字	
✓ 為母的	東方雜誌用	二千五百字	陸元
✓ 兩性間的道德關係	婦女雜誌用	五千五百字	拾元
✓ 以上六月份共稿四種合計洋肆拾元			

左右，不付译费。前星期起，座位移于楼上，夹在端六、经字二座位之间，较易稽察，此后成绩或可稍佳，此复

菊生先生

□ 九年七月八日

沈雁冰君译稿：

《我们该怎样预备了 去谈妇女解放问题》	《妇女杂志》用	} 三篇九千字	拾伍元
《第一飞行机》	《妇女杂志》用		
《新妇女界之评论》	《妇女杂志》用		
《近代文学的反流》篇	《东方杂志》用	一万四千字	贰拾陆元
《女子的觉悟（续）》	《妇女杂志》用	} 一万七千字	贰拾伍元
《娼妓与贞操》	（又）		
以上四月份共稿六种 合计洋陆拾陆元			

《新社会的结婚和家庭》	《妇女杂志》用	三千字	} 柒元
《家庭服务与经济独立》（又）		一千六千字	
《安得列夫》	《东方杂志》用	五千字	拾贰元
《两性冲突的原因》	《妇女杂志》用	八千字	拾玖元
以上五月份共稿四种 合计洋叁拾捌元			

《娼妓与贞操（续）》	《妇女杂志》用	一万五千字	} 贰拾肆元
《怎样能使妇女运动有实力》（又）		一千五百字	
《为母的》	《东方杂志》用	二千五百六十字	陆元
《两性间的道德关系》	《妇女杂志》用	五千六千字	拾元
以上六月份共稿四种 合计洋肆拾元			

这三页用毛笔书写的稿费单，从字体上看，肯定不是高梦旦所写，也不

是王云五的笔迹。因为从时间上看，1920年7月，王云五还没有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所以也不可能是王云五。但从其口气和做法看，用现在的话来说，肯定是编译所一位管理干部。可惜这个署名现在没法辨认。不过，从其报告中，可以看出编译所对自己职工的管理还是非常细致和上心，对茅盾的了解也十分清楚，不愧是老板式的管理者。一方面肯定拿48元月薪的茅盾“办事精神尚好”，另一方面又指出茅盾向外投稿和参加共学社等“不免有纷[分]心”。而且当时编译所的领导看到茅盾已经完成《四部丛刊》的底片审查工作，再让茅盾坐在《四部丛刊》的办公室里，认为工作量太少了，担心茅盾分心去做其他事情，所以将茅盾的办公地方搬到楼上，桌子安排在杨端六和钱经宇两位前辈之间，当局意图这样便于“稽察”茅盾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

材料里的经字就是钱智修，浙江嵊县人，是一位1911年进商务的前辈，比茅盾大13岁，据说他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在上海滩有“洛阳纸贵”赞誉，上海的一些进步报纸争相向他约稿。当时茅盾搬到他身边办公时，钱先生刚刚从杜亚泉手里接任《东方杂志》主编。钱先生后来离开商务印书馆从政了。

杨端六先生比茅盾大11岁，生于1885年，1966年去世。曾经留学日本、英国、德国，是留日学生中华学艺社的社员，1920年从欧洲回国，由郑贞文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社工作的。据《商务印书馆110年大事记》记载，杨端六是1921年进商务的。现在，从这件史料看来，杨先生应该是1920年进商务的，而不是1921年。据郑贞文回忆，杨端六“于1920年自欧洲归国，由我介绍入编译所的东方杂志社工作”。否则在1920年7月8日的史料里，茅盾的座位安排在杨、钱之间就无从说起。据说，杨先生是经济学专家，对会计学尤其擅长，所以在商务时，高梦旦发挥他的专长，让他参与会计制度改革，成绩卓著，他后调任总公司协理。但是当时茅盾与杨端六先生在一起办公时，杨端六也在《东方杂志》当编辑（撰述），而且还没有结婚。杨端六在1921年与才女袁昌英结婚，当时杨先生已经36岁。

材料中说茅盾“充共学社社员”的细节，茅盾传记都未曾提及。茅盾参加过共学社，是茅盾生平史料的新发现。共学社于1920年4月成立于北京，

由梁启超发起。目标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共学社当时阵势非常大，核心人物是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勱、张东荪等，但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范源濂、张伯苓、严修、林长民、张公权、丁文江、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胡汝麟、张嘉璈、梁善济等名流都列名发起。共学社成立董事会、评议会，都是各界精英。同时，共学社的成立得到一些大企业的支持和资助，所以，1920年9月梁启超将《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由共学社主办，蒋百里主编。共学社是个纯粹的民间学术机构，所以参加共学社成为社员的条件要求只有一条，即翻译5万字以上。而此时的茅盾已远远超过这个条件。据说，当时共学社与商务协定，在商务出版丛书，有一百多种，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不同的思想政治思潮。

不过，编译所管理者虽然了解茅盾的工作情况，但是从这个报告看，对茅盾的创作翻译以及其他活动，似乎不清楚。先从这个稿费单看，他们只是将署名沈雁冰或者当局了解的笔名的翻译稿子才付稿费。因为实际茅盾发表的翻译文章还要多，他们都忽略不计，而且时间上也不是很规范。比如说4月份的《我们该怎样预备了去谈妇女解放问题》一篇，其实不是4月份发表的作品，而是发表在1920年3月5日的《妇女杂志》上，而《女子的觉悟》是在三、四月的《妇女杂志》上，分上、下篇发表的，现在统一归为4月份的稿子。还有，再从报告看，当时的茅盾似乎很空闲，《四部丛刊》可以不管，每个月只要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上发表万余字，就完成任务了。领导感觉太轻松了，所以编译所要给他压力，换个座位，让两位前辈监督他。

其实，1920年的上半年，茅盾的工作不少，除了用笔名写文章外，从1920年1月开始，茅盾参与《小说月报》的部分改革，主持《小说新潮》栏目。这项任务应该计在茅盾的工作量里面，但是这份向张元济先生报告的材料里却只字未提，是领导不计还是不屑？

不过，此时的茅盾有所分心的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因为1920年上半年陈独秀到上海后，开始物色革命同志，《新青年》杂志移到上海后在这一年的5月份重新出版，茅盾被陈独秀看中，开始涉及其中，所以从工作角度看，分心是肯定的。还有，当时茅盾和一帮老乡的年轻人组织“桐乡青年社”，

牵涉到茅盾的一些精力也是事实。不过，编译所尽管对茅盾管理甚严，甚至让前辈监督他的日常工作，但是从1920年10月起，茅盾用相当多的精力投身革命，成为中共早期的党员之一，却是用心良苦给茅盾换办公室的编译所领导没有想到的。